

皇帝 与 文人



上海文艺出版总社
百家出版社

百家文史讲坛

皇帝与文人

周天 著

上海文艺出版总社
百 家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皇帝与文人/周天著. —上海: 百家出版社, 2007. 4

ISBN 978-7-80703-641-8

I. 皇… II. 周… III. 皇帝—关系—知识分子—研究—中国—西汉时代 IV. D69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47858 号

书 名 皇帝与文人

著 者 周 天

出 品 人 丁国联

责任编辑 刘小明

装帧设计 梁业礼

出版发行 上海文艺出版总社 (www.shwenyi.com)

百家出版社 (上海市茶陵路 175 弄 3 号 200032)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信老印刷厂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9

字 数 220000

版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4000 册

ISBN 978 - 7 - 80703 - 641 - 8

定 价 20.00 元

前 言

本书说的是古代政治家与文人的关系。这种关系非常复杂。文人在中国地位最高的时期，乃在夏商周三代。巫、史、卜、祝，是最早的知识分子，他们的职责是交通于神、人之间，祈求上天得来的卜辞代表着神意，可以改变天子的决策。而卜辞的解释权，正在巫、史们手上。巫、史们通晓历史、研讨哲学、熟悉政事，是当时统治阶级中最有学问的一个阶层，所以地位也特高。不过，当秦始皇以法家思想一统天下以后，文人的命运就变惨了，禁绝百家，焚书坑儒，秦王朝也因此二世而亡。此后，每当皇帝具有法家倾向时，文人便遭厄运。以此观察历史，累试累验。

秦王朝垮了，西汉王朝建立了，皇帝与文人之间，不免需要相互摸索、磨合，重新建立起某种比较稳定并对双方都有利的关系来。本来，皇帝所代表的政治家，与文人所代表的知识阶层，原就是同一统治阶级的不同组成部分，利益一致；但是，在封建中央集权制的新的历史时期中，文人失去了代表神意的特殊身份，又失去了诸侯争霸的环境下国君们都在争取文人的特殊土壤，秦始皇所建立的君权独断的皇权制度，被汉代继承下来了，双方之间，需要一个重新整合的过程。

文人当中，也有不同类型：一些人，自认为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学说的继承者，他们各治一家，以求用世。需要说明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学说，研究的都是政治学，并不是单纯的科学或学术问题，而是治国安邦的学问。只不过，各家学说本来都有自己的长处与局限，不同的继承者也有高下之分，加之汉代的封

建中央集权制也不同于春秋战国，旧的学说也要发展变化，才能适应新的时代和制度，这是一个很复杂的磨合过程，需要若干代的努力；另一些人则成了御用文人，是皇帝的应声虫；不过，更值得我们重视的，是文人当中还出现过少数大思想家，他们善于观察时代特点、时代弊病，长于融会贯通百家学说，从而能提出有针对性的治国理论来。就西汉时期而言，陆贾在汉初，及时地提出了实行变战时体制为和平时时期体制的战略转变，稳定了刘汉政权；贾谊指出了削弱分封王国对于巩固汉代中央王朝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对官僚与民众加强道德教育以利稳定的主张；董仲舒则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学的政策。他们的治国见解，经皇帝们采纳后实施，对西汉的繁荣、稳定起了关键性作用。

这里，我们应该特别说一说司马迁。作为大思想家与大历史家，司马迁敏锐地看出了秦、汉新建立的封建中央集权制，由于受到法家思想的影响，强调君权独断，缺乏君权制约，因而存在着较大的缺陷；由此，他综合了历史上的君权制约的思想素材，在他的名著《史记》中，建立了一个相当系统、完整的君权制约思想体系，为封建中央集权制的成熟提供了思想基础。只不过，司马迁的思想太超前了，与他同时期的政治家汉武帝，虽然史称雄才大略，但其才略还不足以接受司马迁的天才思想。于是，这一天才思想便只能躺在竹简之中，耐心等待着识货的政治家。这一等就是七百年，直到历史上出了唐太宗一朝君臣，司马迁的《史记》才发挥出作用来，并成为贞观之治的思想基础。

本书说的就是前述诸如此类的有关故事，即政治家与知识阶层如何或离或合、相辅相成、有矛盾有统一的若干历史叙事。人云：“以史为鉴”，相信读者会从中受益的。

周 天

2007年3月

目 录

前言	1
一、文人身份一落千丈	1
(一) 秦始皇活埋儒生	1
(二) 文人时代苦闷的投影	4
(三) 养士制度的沿革	12
(四) 政治后退文人沾光	20
二、形势变化下的适者生存	23
(一) 古代学术、政治不分家	23
(二) 中庸之道平议	25
(三) 儒家先辈的独立人格	29
(四) 叔孙通其人其事	33
(五) 儒学思想家陆贾何以鼓吹道家无为思想	39
(六) 政治家们大都是杂家	43
三、被经济、政治需要所制约的学派斗争	47
(一) 方针政策上的大转弯	47
(二) 破帽子该不该永远戴在头上	48
(三) 思想超前的文人是孤独和悲哀的	52
(四) 被糊涂杀掉的法家晁错	58

(五) 婢学夫人的纵横家后代	63
四、“黜百家、尊儒术”后文人命运的变化	73
(一) 皇帝独揽用人大权下的文人心态	73
(二) 道家学派的最后挣扎	77
(三) 儒学成为做官的敲门砖	83
(四) 董仲舒的新儒学概观	89
(五) 统治阶级思想家与政客有别	98
五、法家、纵横家的改换门庭	104
(一) 重法严刑的汉武帝	104
(二) 张汤审讯老鼠	106
(三) 天子脚下的长安市长难当	112
(四) 纵横家的最后代表	118
六、儒家的分化	126
(一) 在官场中的处世态度有关命运	126
(二) 政客公孙弘画像	127
(三) 可以称得上“中国的脊梁骨”的儒生们	136
(四) 急流勇退并非易事	144
(五) 理论失足的实践后果	148
七、御用文人的出现和扬雄对它的批判	153
(一) 司马相如的行骗故事	153
(二) 御用文人功过论	156
(三) 东方朔走钢丝	159
(四) 与汉宣帝针锋相对的扬雄	169

八、司马迁的封建制约思想体系·····	176
(一) 本书在历史评价上与《汉书》有别·····	176
(二) 司马迁的大致经历·····	179
(三) 古代制约思想素材·····	185
(四) 司马迁的伟大加工·····	193
(五) 察见渊鱼者不祥——中国第一例文字狱解剖·····	215
九、汉武帝的晚年悲剧证实了司马迁的预见·····	220
(一) 汉武帝的宫廷悲剧·····	220
(二) 巫蛊事件的起因·····	221
(三) 哭着赖在地上不肯当丞相·····	223
(四) 长安城里一场糊里糊涂的内战·····	228
(五) 太子的死和汉武帝的懊悔·····	236
(六) 另一窝皇亲国戚跟着完蛋·····	239
(七) 汉武帝晚年悲剧的教训何在·····	242
十、唐太宗与司马迁·····	245
(一) 释题·····	245
(二) 唐太宗熟悉《史记》的例证·····	246
(三)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252
(四) 虚心纳谏及其制度化·····	255
(五) 强调德治和执法公平·····	263
(六) 用人标准与皇帝修养密切相关·····	268
(七) 皇帝对后代的教育·····	273
(八) 司马迁可以无憾矣·····	277
余论·····	278

一、文人身价一落千丈

(一) 秦始皇活埋儒生

中国封建社会中，知识分子的命运问题，是一个令今人颇感兴趣的问题。一方面，整个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都是知识分子的劳作，而与此有关的封建政治制度，离开了知识分子，也建立不起来；另一方面，对于整个封建统治阶级如此“劳苦功高”的知识分子群，其总体命运，却又是坎坷而可悲的。所以人们至今一谈起知识分子发展才能的阻力，往往会顺口称之为：封建桎梏。

这是二律背反，需要解释和探究。

本书讨论西汉文人命运问题，就是想解剖一个麻雀。因为西汉较之先秦，知识分子的地位，起了一个重要的变化。从这个变化说起，也许能比较迅速地由现象进入本质。

秦以前的春秋战国时代，知识分子一般是能够相对地保持着自己的独立人格的。那时的知识分子，刚刚从统治阶级内部分化出来，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阶层，而中国大地上，则是由分封制所形成的许多国家，林立争雄，各学派的知识分子们，便在林立的国与国之间周游，兜售自己的政治主张，那些不想用世、为官的知识分子，也能够自说自话，讲自己学派的观点，政治家们一般也不加干涉。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百家争

鸣。所以，百家争鸣，是以知识分子的至少在外观上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为前提的。至于在实质上，知识分子大都是一定阶级、阶层在思想上和著作上的代表人物，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无需细说。

只说这种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保持，是在何时发生了变化的呢？自秦开始！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要卢生为他求“不死之药”——也就是吃了可以长生不老的仙药，卢生和侯生背后商量，认为秦始皇“刚戾自用”、“乐以刑杀为威”、“不闻过而自骄”、“贪于权势”，总之，毛病太多，“未可为求仙药”，于是就一起逃走了。他们背后议论的话，不知怎么的，传到秦始皇的耳朵里去了，于是秦始皇要御史对所有在秦都咸阳的知识分子，来一个大审查，大概还要他们互相揭发，这一来就揭出了四百六十多个背后讲坏话的知识分子，全部活埋了，“使天下知之，以惩后”。这是中国实行封建中央集权制以后，知识分子倒楣的开始。

汉承秦制，虽然西汉王朝的做法，没有秦王朝那样笨，但封建中央集权制下面，要求统一思想的总趋势，却是与秦代一致的。所以，自此以后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漫长岁月里，虽然一坑几百个知识分子的那样露骨的暴政，倒也并未经见，但也不过是把统一思想的做法，锻炼得比较精巧一些而已。就其总体而言，知识分子在封建中央集权制下面，再要像春秋战国时期那样保持独立人格，却是较难做到了。所以像先秦那样的百家争鸣的盛况，也就一去不复返了。

这种封建思想统治，既然并不仅是个别朝代、个别皇帝的暴政，而是一种带普遍性的现象，这就值得探究。

本书就打算解剖一下西汉统治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同知识分子的关系，特别是西汉全盛时期的代表人物汉武帝同知识分子的关系。

系，想从中考察一下文人命运的若干带普遍性的问题。我相信，对于今天的读者，这些问题大约不会因时代的久远而失却兴味。

我是专业搞文学理论的，我们不妨就从文学状况说起。

我们现在谈到古代各个时期的文学创作，总是习惯于讲每个时期的代表性的文学样式。先秦是《诗经》、《楚辞》、寓言，汉代是赋，以后则是唐诗、宋词、元曲等等；后人议论来议论去，几乎一致公认，汉赋最没有分量，只好拿无名作者的乐府来为汉代凑数，免得这个朝代发生准空白现象。何以人们会觉得汉赋最没有分量呢？因为汉代写赋的文人，跟在皇帝屁股后面转的为多，所写的赋，往往是吹捧皇帝的武功文治，楼堂馆舍，后代人看了，固然能增加点历史知识、了解一些当时的经济生活细节。不过中国文人历来在传统上，把文学创作看成是一件严肃的事情，要求为文应有补于国家、人民，文的载道、言志说，诗的言志，比兴说，都证实了从来文学创作目的的严肃性，拿这个标准一衡量，便觉汉赋差劲了，所以自唐代以来，对汉赋的评价，逐渐降低。到解放以后，因为强调文学批评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作用，强调文学的人民性，标准自不免更高一些，矫枉过正，对过去历史上评价本来高的东西，也往往要降低尺寸；对历史上本来评价就不大高的汉赋，则更趋低落。低到什么程度呢？差不多是对汉赋不屑一顾，连批判它的文章都不大有。俗话说：骂你还是看得起你。这话有一定的道理。挨批判还不算真正的冷落，“曲有误，周郎顾。”不屑一骂，这才冷到骨子里去了。汉赋在一些年里，遭受的正是这一类型的冷落。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里，中学语文课本中，什么朝代的代表性作品，都多少要选一点，让青少年们略窥一斑，唯独汉赋不选，就我的印象中，好像连毛泽东同志提到过的枚乘的《七发》，似亦未在被选之列。代表整整一个朝代的文学作品，在后代受到如此的冷遇，想想当时的许多赋作者，也自是呕心沥血地写作的，他们倘若九泉有知，不知会如何伤心！

这样的冷遇，其实也有不尽公正之处。唐人写诗必读《昭明文选》，杜甫就是一个例子，可见汉以后的唐代人，至少是注意从汉赋学习技巧的，并未一概抹杀。当然，我们也承认，汉赋中吹吹拍拍的东西，的确比例较高，文字又疙瘩，就我的文化素养而言，司马相如的《上林赋》，老实说不查辞书还实在看不懂。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说唐人读汉赋是当类书用、背熟其中典故的，这说法也许有点道理，我们现在有多种辞书，所以汉赋的重要性自然下降。当然，看懂了《上林赋》，其内容也不过是歌功颂德，这也足以使汉赋贬值。不过，汉赋中也有并不歌功颂德的东西，并且还有若干颇有深度的作品，不能一概而论。据我看，有两篇多年来似已被人们忘怀的汉赋，东方朔的《答客难》和扬雄的《解嘲》，就不应同那些吹吹拍拍的东西一例看待。它们都包含着一些深刻的思想，而和本书所要讨论的题目密切相关，不过作者写作的时候有点难处，话没有也不能全部说透，需要我们后人，从一定的视野高度，来照亮它们。一旦照亮、点透之后，我们自己也会惊讶。哦！原来汉赋中还有这样的佳作，读书不经心，就会失之交臂！

（二）文人时代苦闷的投影

这两篇赋深在何处？西汉文人的时代苦闷，在这两篇赋中得到了反映；由此追探下去，还能发现它所揭示的有关时代本质的更深刻的内涵。

《答客难》一赋，《史记·滑稽列传》所附褚先生补文中，有个摘要，摘得有些破碎，似失神髓，好在《汉书·东方朔传》所引，看来是全文，我们便以《汉书》为准。这篇文章，用的是假定有一个“客”向东方朔提问题，再由东方朔加以解答的形式。客人问：“苏秦、张仪壹当万乘之主，而身都（居）卿相

之位，泽及后世”，而你东方先生呢，“修先王之术，慕圣人之义，讽诵《诗》《书》百家之言，不可胜记，著于竹帛”，“自以为智能海内无双”，“悉力尽忠，以事圣帝”，何以至今还不过只做了一个小小的郎官呢？

这似乎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何以难呢？东方朔在汉武帝时为郎官，和他同时期的，也有从布衣提拔到宰相的公孙弘，不能说汉武帝完全不提拔人才，公孙弘这个人很会拍马屁，今后我们还会说及，但这话在写文章的当时是很难明说的，理由自明。剩下来还能说什么呢？除了东方朔骂自己无能外，其他话如何出口？

不过，东方朔还真会夹缝里做文章，并且做出了深度：

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岂可同哉？

夫苏秦、张仪之时，周室大坏，诸侯不朝，力政争权，相禽（争斗）以兵，并为十二国，未有雌雄。得士者强，失士者亡，故说得行焉！……

今则不然。圣帝德流，天下震慑，诸侯宾服。连四海之外以为带，安于覆盂。……动发举事，犹运之掌（天下可运于皇帝之掌中）。贤与不肖，何以异哉？

东方朔这个人，看问题的能力，无论如何值得佩服。他一下子就抓住了事情的本质。战国时期是诸侯割据，地方分权，大家都要改善政治以求富国强兵，所以人才就显得重要；西汉是中央集权，天下一家，皇帝一个人说了算，大家共同吃大锅饭，贤与不肖之间就不可能有什么区别了。

于是，知识分子的地位下降，就成为必然趋势，这句话东方朔没有明讲，但是，他对西汉文人处境，有一个相当生动的比喻性概括：

故绥之则安，动之则苦；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渊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虽欲尽节效情，安知前后？

这一组排列句，语法结构很妙，全部没有主语。仔细一推敲，主语全是皇帝，只宜省略，心照不宣；宾语那就毫无疑问，都是文人及其遭遇。皇帝高兴，你就上天堂；皇帝一不高兴，你就得下地狱。当然就无所谓贤与不肖的区别了。岂但如此？到最后一句，主语和宾语对调了一下，文人们既然今天不晓得明天的命运，岂能不战战兢兢过日子？“安知前后”，就是自己不能掌握自己命运，说不定随时会垮台之意。

总而言之，地位大降，一落千丈！

然后，文章再解释地位何以大降的原因：

夫天地之大，士民之众，竭精驰说，并进辐辏（像车轮上的支轴向着轮子的轴心一样）者不可胜数。悉力募之，困于衣食，或失门户。使苏秦、张仪与仆并生于今之世，曾不得掌故（相当于今之档案、图书管理人员），安敢望常侍郎乎？……

故曰：时异事异。

这就是核心问题：天地之广，中国之大，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只剩了到皇帝那里找出路的一条路，战国时的多出路变成了西汉的单一出路，粥少僧多，即使皇帝老儿（不管是英明还是昏庸）拼命安排，也还是安排不过来。那么，苏秦、张仪纵有如簧之舌，如果生在西汉，还不照样是死路一条？时代区别就在于此。“故曰：时异事异。”

你看！东方朔只用了很少一点字数，把先秦和西汉的时代区

别，以及对知识分子境遇的影响，说得如此透彻！推而广之，在中国历史上，除了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外，此后的从三国到南北朝时期，唐末的藩镇时期，知识分子就相对地受到重视些，思想也活跃些。三顾茅庐，作为历史掌故，发生在三国时期，绝非偶然。没有这点历史因由，《三国演义》绝对敷衍不成那一大段生动的小说情节，这故事如果写在西汉封建中央集权制巩固时期，就显得不真实了。因为天下太平，皇帝无此渴求求贤移樽就教的迫切需要！倘若我们再进一步推而广之，拿封建社会同资本主义社会相比，在商品经济发达的社会中，由于社会分工的细化，人才的出路渠道多了，就比封建社会的单一出路大不一样。我们如果纵观现今世界上人才流动的趋势，岂不是觉得，东方朔先生两千年前的观察，确有高明之处吗？

当然，理论既然是抽象的，就往往只能从一个方面，一个角度立论，而生活和历史，要远比理论复杂得多！西汉的建立和巩固封建中央集权制，包括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不利于知识分子的措施，并不是哪一位汉家皇帝或是汉武帝个人的一时心血来潮。相反的，在当时来说，倒是一种历史进步和历史必然性，这个问题，我们后面将有机会详说。现在回过头说东方朔，作为当时人，能敏锐地发现西汉同先秦的时代区别，这自然是一种闪光的思想。在西汉文人当中，有这类闪光思想的人，并不止东方朔一个，摒弃这些历史上的闪光的思想素材，未免可惜。所以我们要把它们加以掂拾和整理，以利后来者。

继东方朔之后，有扬雄作《解嘲》，载《汉书·扬雄传》。此赋进一步发挥了《答客难》中的观点。只不过，东方朔的文章中，还多少流露一些希望汉武帝能擢用他的情绪；而扬雄生活的时代则在西汉后期，封建中央集权制压抑人才的弱点，也已差不多暴露无遗，所以，作为特定历史时期在扬雄心情上的反映，扬雄此赋表现了彻底的悲观主义。也正因为悲观，他的分析又比

东方朔更为深透。他着重在知识分子作用的发挥上，来比较西汉和前代：

昔三仁（微子、箕子、比干）去而殷墟，二老（伯夷、叔齐）归而周炽；子胥死而吴亡，（文）种、（范）蠡存而越霸；五羖（百里奚）入而秦喜，乐毅出而燕惧；范雎以折摺（范雎在魏国受辱，“折胁摺齿”，即伤胁落齿后去秦）而危穰侯（代穰侯为秦相），蔡泽以噤吟而笑唐举（唐举善相，曾嘲笑蔡泽相貌委琐，结果蔡泽到秦国受到重用，“噤吟”，大约是对蔡泽的相貌不说好话之意）。

这是说前代有能力或是有威望的知识分子对国家存亡、兴衰发挥的关键性作用，以及有为的国君如何注重收罗人才，这里用了殷和周、吴和越的对比，充分说明了“得士者富，失士者贫”的历史经验。

那么，西汉时期怎么样呢？

天下之士，雷动云合，……家家自以为稷契，人人自以为皋陶，……当途者升青云，失路者委沟渠，旦握权则为卿相，夕失势则为匹夫。譬如江湖之崖，渤澥之岛，乘（阵）雁集不为之多，双凫飞不为之少。

这说法，大致意思和东方朔差不多，但又有一点引申。天下之士，人人都自以为是人才，而皇帝则根本弄不清楚谁是人才。这就是说，皇帝选拔大臣已经全无标准了。这就造成了所有知识分子在皇帝面前全等于零的怪现象：一大群也不算多，一两个也不算少，就是说，大家全是零。

这真个是愤慨已极的言论。扬雄为什么会说这样极端的话呢？据《汉书·扬雄传》说，《解嘲》作于“哀帝时，丁、傅、董贤用事”之际。我们单举一个董贤为例，就能说清楚扬雄的愤慨之所从来。

《汉书·佞幸传》说，董贤是汉哀帝的男宠，用今天人所共知的语言来说，就是同性恋对象。汉哀帝当皇帝后不久，就将这个董贤从小小的郎官，一下子提拔成为大司马卫将军，“百官因贤奏事”，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而当时董贤才二十二岁。后人说的“断袖之癖”，典故就出在《佞幸传》中，汉哀帝同董贤一起睡午觉，董贤熟睡了，身子压在汉哀帝衣袖上，哀帝要起床，不忍惊醒董贤，于是用刀割断衣袖起来，所以后世此语专指男子的同性恋。把这样一个宝贝提拔到总揽朝政的位置上，当时的政治糟到什么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而扬雄本人呢？则是同时代所有学问家们都共同敬佩、尊重的大学者，历事汉成帝、汉哀帝、汉平帝三朝，都是小小的郎官，“三世不徙官”。我们只要看他在《解嘲》中把西汉知识分子的遭遇解剖得如此深刻，就可以知道，他还不仅是学问家，政治眼光也相当敏锐。两人遭遇的这一对比，我们就可以知道扬雄的愤慨从何而来了。看懂了这层意思，前面引文中何以用范睢、蔡泽相貌长得难看之典，也就不难索解，目的在于对比地讽刺汉哀帝的以貌取人而已。

于是，扬雄在《解嘲》中下结论说：

故当其有事也，非萧、曹、子房、平、勃、樊、霍则不能安；当其无事也，章句之徒（所谓“章句小儒”），相与坐而守之，亦亡（无）所患。故世乱，则圣哲驰骛而不足；世治，则庸夫高枕而有余。